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蒋寅 主编

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

〔日〕户崎哲彦 著

中华书局

6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蒋寅 主编

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

〔日〕户崎哲彦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日)户崎哲彦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 1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蒋寅主编)

ISBN 978 - 7 - 101 - 09614 - 9

I. 唐… II. 户… III. ①中国文学 - 古典文学研究 - 广西 - 唐代②石刻 - 研究 - 广西 - 唐代 IV. ①I206. 2
②K877. 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0636 号



书 名 唐代岭南文学与石刻考

著 者 [日]户崎哲彦

丛 书 名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丛书主编 蒋 寅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 $\frac{1}{2}$ 插页 2 字数 316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614 - 9

定 价 54.00 元

前言

蒋寅

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辑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

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让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我们的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

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

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诃钉,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80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

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2011年1月10日

目 录

唐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与岭南地区

- 中国岭南地区文学研究的倡言 1
- 一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与岭南 1
- 二 唐代诗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的本质 7
- 三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研究的方法及其必要性 17
- 结 语 24

唐代桂林石刻的特点及其研究法

- 《桂林唐代石刻之研究·前言》 27
- 一 石刻的史料性及分类 27
- 二 唐代的山水文学与岭南地区 31
- 三 桂林摩崖石刻的重要性及其特征 34
- 四 石刻的拓本和本研究法 36

广西兴安县乳洞岩石刻的特点及其分类

- 《中国乳洞岩石刻之研究·前言》 40
- 一 桂林山水与乳洞岩的石刻 40
- 二 乳洞岩石刻的特征及石刻分类 44
- 三 乳洞岩石刻至今不为人知的原因 47

四 乳洞岩的沿革·····	49
五 乳洞岩石刻一览表·····	50
关于成语“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出处和典据	
——王正功的诗和范成大、柳宗元的评论·····	55
序 言·····	55
一 王正功的诗及其发现·····	57
二 明清人的范成大说及其背景·····	60
三 范成大的评论及其思想·····	65
四 王正功的诗句与柳宗元说·····	73
结 语·····	77
韩愈的岭南山水文学与柳宗元·····	82
前 言·····	82
一 唐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与韩愈·····	83
二 韩愈的岭南山水文学与柳宗元·····	88
三 对山水风土的惊异与恐怖·····	105
结 语·····	125
桂林华景洞《李珣题名》石刻与许浑《寄李相公》两首诗考·····	128
前 言·····	128
一 “牛李党争”与许浑《闻韶州李相公移拜郴州因寄》诗·····	129
二 许浑《寄郴州李相公》诗的疑点·····	137
三 “牛李党争”开端的疑点·····	145
结 语·····	147
韩愈撰《柳州罗池庙碑》之复原及其庙碑失存年代考略·····	150
前 言·····	150
一 宋拓《柳州罗池庙碑》之传世·····	151

二 唐刻《柳州罗池庙碑》之款式及其释文	155
三 据宋石本校核《罗池庙碑》诸本	159
四 唐刻《柳州罗池庙碑》失存年代	164
结 语	170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撰文及立碑年代考辨	174
前 言	174
一 《柳州罗池庙碑》当作于长庆三年	174
二 柳州《罗池神碑》当立于长庆元年正月	179
三 立庙原因及韩愈佚文《祭柳子厚文》	185
结 语	188
桂林南溪山现存李渤、李涉诗文石刻考	190
前 言	190
一 桂林南溪山李渤、李涉诗文撰刻年	191
二 李渤、李涉诗文之校勘	193
三 李渤自号“成纪县子”与李涉自号“青溪子”	201
四 李渤、李涉南溪山石刻之书人	204
结 语	208
白居易《七老会诗》中所见“卢贞”考辨	211
前 言	211
一 卢贞由河南府尹转岭南节度使及其年代	212
二 白居易《卢尹贺梦得会中作》诗所云“卢尹”	219
结 语	222
元晦事迹考略	
——据石刻补正史载	224
前 言	224

一 元晦的世系	227
二 元海的事迹	235
结 语	263
韦瓘佚诗《游三乳洞》及其事迹考辨	267
前 言	267
一 韦瓘佚诗《游三乳洞》之复原	267
二 韦瓘事迹考辨	270
结 语	279
广西上林县唐代石刻《韦敬辨智城碑》考	283
前 言	283
一 《韦敬辨智城碑》校勘	285
二 《韦敬辨智城碑》与《韦公厥智诚峒序》之关系	326
三 “韦厥”及唐宋岭南少数民族“韦”氏	334
四 羁縻州“廖州”、“鹧州”与韦敬辨一族之迁徙	360
五 《韦敬辨智城碑》之社会思想及其文学成就	385

唐人所发现的山水之美与岭南地区

——中国岭南地区文学研究的倡言

一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与岭南

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一言以蔽之,是指文官们对山水之美的发现由北向南的拓展。其阶段性特征表现在政治、地理和文体上。迁都、领土的扩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文官的派遣,正是在这三者由北向南推移的过程中,山水文学才得到了不断地深入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文人官僚,因此其发展与中国官僚体制的进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山水文学也不例外,并且关系更为密切。

学术界普遍认为,山水文学始于汉末魏晋时期,是当时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文人纷纷逃离官场遁入山林的结果。所以,这个时期的文学带有很浓的老庄思想色彩,即所谓玄学为宗旨的“隐逸文学”倾向。对自然山水的喜好,在《老子》《庄子》中随处可见,从孔子的名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在《孟子》里的梁惠王的庭园,《列子·汤问》里“知音”的故事中所讲述的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琴乐的鉴赏法等中也得以充分体现。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先秦及周代时,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爱好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虽然如此,并没有因此而结出文

学之果实。要将其以诗文的形式,以一定的篇幅表现出来,则须等到汉代官僚体制中文人的出现,诗与赋的表现形式得到发展以及此后由于社会动乱而引发的回归自然的潮流之后。对于这一点,据钱钟书(《管锥编》)引用清人恽敬(1757-1817)的《游罗浮山记》中的“古之善游山水者,以左徒为始”为证指出,积极地以山水景观为体裁的文学始于“行客、逐臣”,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不是隐士之回归自然,而是官僚被放逐地方的贬谪事件。例如,南朝宋代的谢灵运被公认为是山水诗的始祖,众所周知,谢灵运的山水文学是以左迁地永嘉郡为中心的浙江省的山水为舞台的,所以《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另外,不应忘记晋朝的王羲之,诚如盛唐的独孤及在《马退山茅亭记》中说到:“周王(穆)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屐齿不及,……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遇右军(王羲之),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诚如中唐的裴通在《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所讲的那样:“越中山水之奇丽者,剡为之最,剡中山水之奇丽者,金庭洞天为之最。”若论及对山水美的发现,当以会稽(唐代的越州)郡守王羲之意识到的为多。

中国古代的文官遭贬谪或者流放而不断地发现当地的山水之美,其背景是从西晋洛阳到东晋建康(即今南京)的迁都为止。不少人意识到这个地理上的变化——客观条件的变化。首都的南移,使得文官开始关注北方所没有的那些南方的自然景色。温暖的气候和秀丽的风光成了文官笔下的题材。与此同时,六朝的《方志》《山川记》的编纂也盛行起来,如在晋朝袁山松的《宜都山水记》、罗含的《湘中记》等以及由此汇集而成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山水之类的记述俯拾即是,这也反映了晋代以后南方开发的情况。可以说,晋代的北方文学与南方自然风光的交融,极大地拓展了山水文学的领域。编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山水之美,

例如晋人袁崧(?—401)的《宜都山川记》里有这么一段：

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壘嶂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条，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仰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此段引于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卷34《江水》，《水经注》对唐代山水文学的影响也很大。可以说，这是文人在危险的三峡里发现山水美的第一个记载。在此之前，三峡因水流湍急，再加上暗礁险滩多，故被人一直恐惧，不敢接近。袁崧在此恶劣危险的地理环境里发现了所谓“山水之美”。除《宜都山川记》《水经注》外，还有晋人罗含的《湘中记》、宋人盛弘之的《荆州记》等，南朝人对于山水之美的发现，从华南的一些地理书中可窥见一斑。还有山水之美的发现与晋及以后的华南的开发与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晋代，北方文学与南方自然环境交融，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的山水文学。王朝的南方经营和官僚的派遣这些政治因素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南方的经营涉及到文学创作的地方和题材，再加上南方经营须要更多的文官，这些都涉及到文学作者自身的变化。

继晋宋南朝之后，山水文学最兴盛的时代则是唐代。唐代山水文学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是以下几个背景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科举考试重视文学。国家政策上对文学的重视，普及了文人的诗文表现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二）道教与佛教比以往更为普及，特别是慧能、马祖等禅宗的盛行并向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佛徒修行在深山幽谷，走遍各地，与地方文官的交流，影响到了文学

作者。(三)南方的开发与统治。岭南地区也是山水之地,但其山水与江南不同。唐代的岭南道,特别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于少数民族内乱频繁,设置了不少的小州郡,往这些地方派遣包括被贬谪者在内的文官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开元四年七月敕:如闻黔州管内县官员多阙,吏部补入,多不肯去。……自余管蛮獠州,大率亦皆如此”。“十七年三月敕:边远判官,多有老弱”^①。(四)流刑的修订。隋朝规定“流刑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到了唐代,改为“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②。流放地延伸了一千里,说明那个地方在此之前是尚未开发的地区。衡州距京两千九百五十里,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多是属五岭的北麓及其以南地区。(五)政治斗争与流放。安史之乱时,许多文官逃难去江南等地,到了中晚唐时官场政治斗争更为激化,流放频繁,其地多是南方,岭南是三千里之地,流放最多。例如“江北人配岭南者,送桂、广府”^③。

在唐代这种政治社会变化的背景下,文官发现所供职地区的山水之美并将其反映在作品中是很流行的。其代表性作家,我们可以举出元结、陆羽、独孤及、李渤、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吴武陵、元晦等等。那么,唐代山水文学与前代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唐朝的发展至少有以下两个新的倾向:一是与地域的变化相伴随的自然美的变化;二是与文学风尚相伴随的文体上的变化。

1. 唐代山水文学的地理变化

说起来,唐代文学在作品发生地或者题材上,按地理上来划分,主要有三个地区:首先是长安、洛阳等都城;此外,作为地方,有西北草原、沙漠;再就是南方的瘴疠之地。唐朝以前的山水文学的主要作者有王羲之、孙绰、袁崧、谢灵运、谢朓等文官,其中包括陶渊明这样的田园诗人。山水文学的舞台是江南地区,尤其以长江